

经文辩读与比较文学

——巴黎 2013 年国际比较文学大会 圆桌会议纪要

Scriptural Reasoning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A Roundtable at the 20th ICLA Congress

张 华

ZHANG Hua

作者简介

张华，北京语言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Hua, Professor, Center for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zhanghua@blcu.edu.cn

Abstract

At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CLA) Cong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 (July 18 to July 24, 2013),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CLA), Professor YANG Huilin chaired a roundtable “Scriptural Reasoning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round 12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gathered and discussed intensivel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criptural Reasoning”. Many attendees were from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an ICLA event. The roundtable focused on exploring “scriptural reasoning” specifically at the interstic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and especially in the broadening of its traditional scope with Chinese resources, thus aiming to deepen the intercultural, inter-lingu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in ideas shared and discussed at the roundtable.

Keywords: Scriptural Reasoning, ICLA,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13 年 7 月 18 日至 24 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简称国际比协）2013 年年会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0 多名代表与会。会议按照常规安排了国际比协委员会会议、大会主题发言、分论坛及圆桌论坛，每个分论坛又按论文题目分为不同小组。在本次大会上，国际比协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杨慧林教授申请了“经文辩读与比较文学”（Scriptural Reasoning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研究委员会并专门组织了一个跨学科的圆桌会议。本文将回顾此次圆桌会议情况并简要介绍各位与会学者的思想。

参加“经文辩读与比较文学”圆桌会议的 12 位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科领域，但都或多或少参与了“经文辩读”运动或者在不同场合与杨慧林等中国学者就此对话和交流过，因此巴黎的聚会是这些东西方学者的又一次思想碰撞和交流。这些学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大卫·福特（David Ford）教授、伦敦国王大学的奥利弗·戴维斯（Oliver Davies）教授、格拉斯哥大学的大卫·贾思柏（David Jasper）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的司马懿（Chloë Starr）教授、拉斐特学院的埃里克·齐奥尔科夫斯基（Eric Ziolkowski）教授、弗吉尼亚大学的彼得·奥克斯（Peter Ochs）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德盛诚（Makoto Tokumori）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黎子鹏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刘耘华教授、北京大学张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等。

“经文辩读”于 1990 年代由西方欧美犹太学者发起，其东方之旅始于 2008 年。是年，杨慧林教授应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Rowan Williams）邀请参加了在兰柏宫举办的一次学术对话，他与大卫·福特教授的对谈让他开始接触“经文辩读”并产生兴趣，之后他开始在中国学术界介绍“经文辩读”，逐步将之作为比较文

学领域内一个跨学科研究理论话题来推介。杨慧林教授自己撰文并申请课题开展“经文辩读”运动，此外还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神学与人文文学”暑期班以及与格拉斯哥大学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等形式与国内外学者切磋“经文辩读”的含义、范畴及运用方法。“经文辩读”的发起者彼得·奥克斯教授和大卫·福特教授也先后来中国进行有关“经文辩读”的讲学和对话，推动了这一理论话题的延展和深度，引起了更多宗教学、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领域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因此，巴黎 2013 年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同意支持杨慧林教授的申请，专门设立了“经文辩读与比较文学”研究委员会，组织圆桌会议并邀请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哲学家参加，这也是这些哲学家们第一次参加比较文学领域的国际会议。

—

本次圆桌会议的议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探讨“经文辩读”的含义及研究领域；一组从神学、哲学角度探讨“经文辩读”的意义和可能性；还有一组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出发来实践“经文辩读”。

在第一组论文中，大卫·福特、彼得·奥克斯、杨慧林和耿幼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何为经文辩读？”、“经文辩读在中国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发展？”、“经文辩读与比较文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等等议题。大卫·福特教授在其论文《21 世纪的宗教与大学：经文辩读、比较文学与中国挑战》（*Religion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criptural Reason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 Chinese Challenge*）中首先回顾了“经文辩读”的来源及其随后在美国和欧洲神学与宗教研究界所引发的讨论和实践。根据大卫·福特教授的介绍，“经文辩读”最早是“文本辩读”，由 1990 年代早期参加全美宗教研究学会（AAR）年会的一批犹太学者发起。这些

学者在会议期间组成“研经小组”一起读经，后来开始邀请其他宗教信仰学者一起读经、辩经。大卫·福特教授很快被这种活动吸引，随后开始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和推广者之一。在这些学者们的推动下，“经文辩读”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在欧洲、北美广泛展开，成为开展宗教间对话的一种方式，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参与“经文辩读”的欧洲和北美学者们集中精力辩读的主要是塔纳赫、《圣经》和《古兰经》。因此，大卫·福特教授特别提到了“经文辩读”在中国的发展及独特性，因为杨慧林教授等中国学者的参与带来了新的局面和气象。大卫·福特教授指出，杨慧林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展了一种通过比较文学进行“经文辩读”的方法，同时通过分析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把哲学和神学诠释学带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大卫·福特教授认为，“经文辩读”与比较文学的“联姻”为神学、宗教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发展均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这样，“经文辩读”将全球阅读量最大或最热销的文本带入比较文学，带给几亿重要人群。这些经文有着被评论和诠释的悠久而又复杂的传统，目前仍是世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除此之外，“经文辩读”也提醒人们注意更多的其他传统经典文本。大卫·福特教授认为，比较文学至少可以通过三个方面丰富文本间性：一、升华经文的文学感染力；二、更多视角研究经文对文学的形塑。比如，研究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与《圣经》和《古兰经》的关系；三、帮助根植于多元文化与文明传统中的宗教传统更好地相互理解。各大宗教都在就文化适应性问题进行论争，而文学则是这类论争发生的主要领域。大卫·福特教授认为，比较文学则可以通过“经文辩读”了解宗教对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可以更好地处理文学研究中的宗教情感。

“经文辩读”运动奠基人、国际“经文辩读”协会主席彼得·奥克斯教授为本次会议专门撰写了万字长文，题目是《经文辩读的一种联系性（非二元性）符号学》（A Relational (non-binary) Semeiotic

for Scriptural Reasoning)。此文也详细描述了“经文辩读”的来源与发展状况，对“经文辩读”在中国与比较文学相遇并成为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充满兴趣、肯定和期望。文章再次重申了彼得·奥克斯教授在其他场合多次阐明的“经文辩读”的实践与理论关系。他认为，“经文辩读”以查经小组活动为形式，以实践为核心，它需要理论特别是诠释学和符号学理论，也建构理论，但理论必须是服务和满足于实践即开展“经文辩读”活动需求的。“经文辩读”在学科意义上对学术最好的贡献应该是“辩读”(reasoning)。

“辩读”在一定程度上是虽然是规律性的、逻辑性的，但迄今为止它仍只是关系性符号学而非二进制式的符号学。这一符号学逻辑也许可以在如下实践中找到资源，如奥古斯丁的禁欲和三位一体经文逻辑、查尔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逻辑、巴特的文本细读符号学、《古兰经》研究中安拉的启示、犹太教研究中的希伯来《圣经》注释，以及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和比较宗教学理论等等。

此次圆桌会议的重要收获不仅仅在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对“经文辩读”的深入研究有益，更在于与会者在热烈讨论和观点交锋时所碰撞的智慧火花。彼得·奥克斯教授在讨论时始终坚持的两点令人印象深刻：1、只有神圣文本也就是宗教文本才可称为“经文”(Scripture)，而所谓真正的“经文辩读”一定是对“经文”所进行的辩读，因为“经文辩读”运动源自对《塔木德》、基督教《圣经》和《古兰经》的辩读；2、“经文辩读”实践必须是“面对面”的查经。就此而言，对非经文进行辩读可以借鉴“经文辩读”的形式和方法，但未必是原初意义上的“经文辩读”。所以，圆桌会议的主题是“经文辩读与比较文学”而非“经文辩读中的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学中的经文辩读”。

杨慧林教授认为，“经文辩读”来自于对神圣文本的诠释与解读，就如同诠释学来自于针对《圣经》的“经文诠释”一样，而今天的诠释学已远远超越只对《圣经》文本的诠释。基督教传教士所

译的中国经典完全可以进入“经文辩读”的视野，而且“经文辩读”可以带来人文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辩读”不仅应当成为当今不同宗教间对话的基础，也应是文学、文化、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他说，在此意义上，相比犹太教徒、基督徒或穆斯林，不信仰任何亚伯拉罕传统宗教的学者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神学家。

耿幼壮教授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题目是《经文辩读如何进入中国语境及中西之间经文辩读是否可能》(How Can Scriptural Reasoning Enter in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Is Scriptural Reasoning Possib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在发言中他追溯了“经文辩读”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再次介绍了这一运动在中国的主要推介者杨慧林教授所做的努力和创造性贡献，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传统的“经学”(Confucian Studies)为“经文辩读”提供思想和理论资源的可能性以及“经文辩读”在中国语境下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其论文题目是以问句形式出现一样，论文再次提出了“什么是‘经文辩读’？”以及“经文辩读如何可能进入中国语境？”等一系列颇具启发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对彼得·奥克斯教授所坚持的观点的回应。耿幼壮教授认为，“经文辩读”进入了具有不同宗教背景和无任何宗教背景的学者的学术视野，它是一种阅读、思考和诠释的方式，是某种形式的宗教对话和比较研究，以及某种形式的伦理活动和社会、政治实践。然而，中国的“经学”研究是以中国特定的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的，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中国的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能否均可以为“经文辩读”所接收呢？

二

奥利弗·戴维斯教授为本次会议准备的论文曾几次变换题目和内容，从最初的《作为一种新神学的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

as a New Theology), 到《实践的大学与全球性自我: 中西之间的创造性相遇》(University of the Practice and the Global Self: Creative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再到最后的《中国与西方的更新诠释学: 走向一种关于修身实践的理论》(Transformational Hermeneutics in China and the West: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Practice of Being Human)。从这些不断变化的题目可以看出, 戴维斯教授是从中国和西方对话以及人类可共享的经验角度来谈“经文辩读”。他的论文对杨慧林教授的诠释学观点予以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而且他认为, “经文辩读”传入中国, 为中国与西方意味深长的相遇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机会。就一般意义的阅读实践如何对待和处理差异上来讲, 今天的“经文辩读”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是“中国的”而不是典型的西方的。但是, “经文辩读”仍然确切地反映了宗教经验中如何区分和消除差异的西方历史, 中国历史却展示了一种通过宗教和解与融合而塑造的身份特征。奥利弗·戴维斯教授说, 中国与西方相遇的核心问题是当今西方历史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二元论是如何被克服的。在一种分享式的阅读经文的实践中, 通过一种协商性的“聚会”形式, “经文辩读”能够正视这一问题。戴维斯教授相信, “经文辩读”来到中国和在中国的发展, 是真正建立全球性诠释学的最佳时机, 通过分享文本阅读实践的“经文辩读”, 进而可以让人们相互分享整个世界。

大卫·贾思柏教授是著名的文学与宗教学教授, 早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创建了宗教与文学研究中心, 他的论文《重返神学性思考》(Returning to Thinking Theologically) 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彼得·奥克斯教授的发言。他认为, 基督教神学在西方经历了 20 世纪的精神创伤和世俗化危机, 之后神学思考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得到发展, 但今天仍面临巨大挑战。在致力于神学思考和研究的同时, 我们必须面对和承认神学思考的变化和迁移, 面对和承认基督教经文和中

国圣书之间持续和不断增长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带来的“经文辩读”和“经文诠释”的新形式。

司马懿教授的论文《预示的经文辩读：民国神学家之读“经”》（*Scripture Reasoning Prefigured: Republican Theologians Reading jing*）非常具体地将“经文辩读”与中国“经学”研究相结合，对比和分析了两位民国时期的神学家赵紫宸和吴雷川的读经和解经方法。她指出，民国时期的神学家们身处战乱时期，一边寻找自己作为中国基督徒的身份，一边在护教和解释《圣经》的过程中熟练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圣经》诠释学知识和“经学”思想，采取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文学表现形式和文体来写作，达到自己的目的。司马懿教授通过具体的文本来分析两位民国早期神学家思想，从中不难看出“经文辩读”的具体例证。

齐奥尔科夫斯基教授的论文《轴心时代与宗教与文学领域中的比较研究》（*The Axial Ag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则以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轴心时代”理论为基础，提出两方面主要看法：一方面，不论“轴心时代”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学术界认同，我们都难以回避这样的事实：最初主要由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倡导的有关“轴心时代”理论的研究，为致力于杨慧林教授所阐释的“经文辩读”中跨学科研究的神学、宗教学和文学学者，提供了丰富、宽广且充满潜力的探索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与其把自己视作处于所谓的“第二轴心时代”甚至一个“地球村”，倒不如更确切地考虑我们处于一个“比较的时代”，至少，作为从跨文化视角面对和思考宗教和文学的人文学者应当如此。中国学者们的“经文辩读”实践提供了一个思路，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

三

德盛诚教授的论文《一个文本如何实现本土化：日本古代作品及其近代阐释》(What Makes a Text Indigenous? A Heterogeneous Work from Ancient Japan and its Early Modern Interpretation)很有意思。他以日本对两部文学历史经典——公元712年的《古事记》(712)和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720)的研究为例，提出了文学文本的本土化理解和诠释问题，阐明了他对“经文辩读”的理解。公元8世纪的日本列岛是古典中国文化的跨地区东亚领域，有两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学文本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古事记》，一是《日本书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均由中文汉字撰写，后者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述相符，而前者却因经历各种诠释而显得是中日两种文化的混杂，它所记载的历史景象与后者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样的诠释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以显示诠释者的政治权威，以至于在随后的日本文学史中，《古事记》的地位远远超过《日本书纪》。德盛诚教授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十八世纪的一位日本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对《古事记》的解释与推崇有关，而且，这种解释与推崇还为大量现代日本学者所接受，以至于在1890年《日本民族文学历史》出版时，《古事记》被放在了第一篇，而《日本书纪》被完全排除到了书外。德盛诚教授批评说，本居宣长的诠释框架受到了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多种局限，在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种局限的时候，我们应该借鉴“经文辩读”的方法，就本居宣长对文本的分析进行语境化研究，以真正获得文化融合语境中的文本本土化诠释。

黎子鹏教授带给本次会议的论文题目是《〈圣经〉中的虚构性再现：中国19世纪的基督教小说》(Fic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Christian Novel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论文详细列举并归类了19世纪中国基督教小说，涵盖了传教士作品、基督

徒作品、翻译作品和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后的原创作品。黎子鹏教授认为，这些作品创造性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形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充分表达了基督教思想或重述了《圣经》故事。对这类作品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理解和解释今天流行的基督教文学作品提供很好的参照，也可以对建立“经文辩读”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刘耘华教授的论文《如何建立中国文化的“解释性建构”：郝大维与安乐哲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解释原则》介绍了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小有名气的两位学者郝大维（David Hall, 1937-2001）和安乐哲（Roger T. Ames, 1947-）。郝大维尽管没有学习汉语的经历，但他的哲学推动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从 1980 年代起，郝大维与汉学家安乐哲合写了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当恰如其分的表达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交融，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比较方法论资源。他们认为当代文化现象是可以恰当诠释的，因为文化根植于历史当中。他们的观点不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雅斯贝尔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ens）和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那样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的原型追溯到公元 5 世纪的西方文明，或追溯到圣奥古斯丁。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解释性建构”（interpretive construct）并将之用于诠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的解释性建构建立于先秦和两汉时期。郝大维和安乐哲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展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刘耘华教授的论文在赞赏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解释性建构”学说的几点不足。

张辉教授的论文《经书还是民谣：〈诗经〉的跨文化解释及其诠释学影响》运用“经文辩读”原则分析了中国古代经典重要文本之一的《诗经》在当地中国学界的命运。在现代以前，《诗经》一直被视作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然而，在深受西方美学和文论影响的当代文学和思想界，《诗经》已经丧失了其经典位置。越来越多

的中国学者仅仅将《诗经》主要视作早期中国民间诗歌甚至歌谣的总汇，在引用、解释和翻译时很少参照古代注疏。令人吃惊的是，来自西方的《诗经》翻译者如理雅各（James Legge）、阿连壁（Clement F. R. Allen）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等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学者却走出一条相反的路径：他们竭尽所能遵守儒家的诠释传统，将《诗经》尊为儒家经典之一，并尽可能运用古代中国的注疏评论来解释和翻译《诗经》。张辉教授希望他的论文可以为当今的“经文辩读”运动提供参考。

张华教授在其论文《〈论语〉与〈古兰经〉的经文辩读》中也实践了“经文辩读”原则。他指出，在进行这两个文本的“经文辩读之前”必须首先消除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论语》不属于神圣经典所以不属于“经文”的误区；二是认为《古兰经》是穆斯林真主安拉的语言，由先知默罕默德用阿拉伯语记录，普通人是不能“辩读”甚至不允许翻译的。事实上，无论是儒家文化圈，还是穆斯林世界，对《论语》和《古兰经》进行的“经文辩读”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而且都打上了各自文化特征的鲜明烙印。张华教授认为，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今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人类的联系也变得空前的紧密。在人类不断的交往活动中，不同文明系统的交流、对话也逐渐深入下去。上个世纪西方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时，作为世界上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却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这一错误的观点。在中国，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已经持续数年，并成为了“文明对话”的典范，可以为促进世界其他文明间相互对话做出贡献。

圆桌会议的议程只有短暂的一天半时间，但学者们的讨论和研究还在继续和深入。正如杨慧林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的总结所言，本次圆桌会议旨在比较文学与宗教研究的交叉缝隙中探索“经文辩读”，利用中国资源突破“经文辩读”的传统框架和范畴，也因此

深化了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学科疆域，进一步扩展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研究领域。